王锡存：坚定信念 不怕牺牲

王锡存（1919—1950），男，出生于今彭阳县红河镇财沟村一个农民家庭。在他不满6岁时，就给人割草、打柴、挑水、放牛羊，送人家小少爷上学。13岁时，进入私塾念书，但只读了几天，就因战乱而辍学，离开私塾后，继续给别人家放羊。

1937年初丢下羊鞭参加环县保安大队，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此时，盘踞在环县的土匪宋阳珍（后投诚）、赵思忠等乘人民政府刚刚建立，立足未稳之际作乱。其中赵思忠股匪骚扰时间最长，危害最大。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严酷的环境中，环县军民与股匪展开了殊死斗争，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1938年4月12日，赵思忠派其部下缪福禄、耿开帮率土匪150余人，首先抢占监狱，放走犯人，后向中共环县县委、县政府驻地进攻。由于当时情况不明，政府工作人员由县长杨玉亭带领，渡河向东山转移。王锡存和一部分战士在县保安大队长宋飞的带领下，一边与土匪激战，一边掩护机关干部向河连湾东山转移。指导员黄德堂和中队长张俊录率一部分战士坚守环县政府，与匪徒顽强战斗。土匪不能得手，于是纵火烧毁县政府大门，继续向县政府院内进攻。激战中，指导员黄德堂、中队长张俊录、中队副王生烈、班长王华、汪思学、妇联主任张月英等10多人英勇牺牲。穷凶极恶的匪徒放走在押犯人，焚毁房屋，抢掠财物，使中共组织和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红色政权面临被摧毁的危险。千钧一发之际，驻防在洪德城北刘家山的红二团一个连闻讯赶来增援，包围了缪福录、耿开帮股匪，经过激战，土匪丢下许多尸体突围遁去。

1938年12月，国民党环县流亡政府迁驻土匪赵老五盘踞的甜水堡，并组建了保安大队，国民党环县政府县长刘谦自任保安大队长，赵老五任副大队长。并在甜水一带编制保甲组织，指使其爪牙，寻机骚扰环县中共组织，妄图夺回政权。1939年12月31日晚，顽匪赵思忠趁元旦节日之际，率部300余人偷袭中共环县党政机关，途中洗劫了洪德合作社及洪德区政府。洪德区自卫军营长高三德闻讯赶至二十里沟口，被匪徒杀害。次日拂晓，赵思忠匪部再次偷袭中共驻环县南关抗日民主政府。他们途经洪德区河连湾村，将该村小学教师王佑作为人质，拖在马后，向县城逼近，并派先头部队化装混入骆驼队到达城东沟。中共自卫军哨兵发现后，当即鸣枪报警，中共县保安大队大队长王世选、中队长王世保闻讯，即率领中队战士和自卫军迅速抢占城郭及庙岗子等制高点与敌战斗。这时，暂撤离于七里沟一带的县保卫科警卫队在中共环县县长杨玉亭的率领下，由七里沟向北到达城东塬，组织农民自卫军和干部数十人下山增援，迂回夹击。赵思忠匪部腹背受敌，激战中，王锡存率警卫1班英勇出击，打死打伤匪徒数十人。午时，赵匪不支，狼狈而逃，逃跑途中，残忍地杀害了小学教师王佑。县保安大队追至二十里沟口获胜而归，在这次战斗中，王锡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表现出色，被破格提升为警卫排长。

1940年1月，赵思忠部在偷袭环县抗日民主政府未遂后，一面派出匪徒，袭击区、乡党政组织，残杀党员、干部，一面大肆散布谣言，煽动环城、洪德、耿湾、车道、虎洞5个区16个乡的800余名自卫军叛乱，酿成了“环县事变”。叛乱持续10余日，有47名革命干部、战士、群众被杀害，20多名干部被绑架。

叛乱事件发生后，陇东公署专员马锡五即率环县、曲子县、华池县保安大队、自卫军及机关干部，配合八路军三八五旅警备二团、八路军后方留守独立五营、定边骑兵一连，共千余人前往甜水一带围剿国民党环县政府及其保安大队。赵思忠倚仗窑儿井沟之地堡暗道和国民党环县县长刘谦外围的配合，负隅顽抗。王锡存请命率警卫排参战，送粮送草，抬担架、挖窨子、消灭敌人，表现十分勇敢。战斗中毙敌30余人，击伤10余人，俘虏70余人。伪环县党部主任张志尹、国民党环县政府一科科长赵鸣琴、书记夏建寅、收发室主任张河图、保安大队中队长耿开帮、缪福录、张兆琪、朱贵荣及赵思忠之父赵星九等被俘，余匪大部被歼。这次战斗，铲除了危害新生政权的一大毒瘤。至此，赵老五盘踞多年的巢穴被彻底摧毁，甜水堡一带获得解放。同年4月，中共在环县成立了甜水区、乡政权。

1942年6月，王锡存担任时任中共环县县委书记徐锡龄的警卫。同年8月的一天上午，王锡存带领两名警卫员保护徐书记下乡检查工作，途中遭遇土匪。在战斗中，徐锡龄身负重伤，王锡存为了保护徐锡龄，让其他两名警卫员用皮带把徐锡龄和自己绑在一起背着，边退边开枪和敌人战斗，掩护区政府其他同志撤退，当他们退到一处崾岘口时，敌人追上来了。当时他们所处的位置南北两面都是深沟，唯独中间有一个十来米宽的崾岘（豁口）可以通过。他向敌人投出几颗手榴弹后，趁着爆炸声和敌人正乱时，打开一个缺口领着大家冒着枪林弹雨尽快地通过崾岘，敌人也随之赶来。他组织人员集中火力守住崾岘，掩护后面的同志脱险。当他们连续打退了敌人的两次冲锋后，环县人民武装大队在县长陈玉山的带领下及时赶到，他们才安全脱险。

1943年1月，面对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环县县委调王锡存到苦水掌土产公司从事保卫工作，任营长，当时他家住环县车道区高台子。他上任后，按照中共环县县委的指示和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发动群众积极兴办各种手工业和加工业，并号召爱国人士、商人和广大群众，捐送寒衣，支援前方，为边区的财经建设作出了贡献。

1948年年初，为了工作方便，中共环县县委把王锡存的妻子邓郁兰从车道区妇联调到环县妇女救国联合会工作，让他回到车道把妻子和孩子一起接到县委去。当时高台子已被当地土匪占领，由于当地一个名叫高四的人告密，王锡存回到家里的当天夜里就被土匪抓捕，土匪头子要他交出枪支弹药，并说出他所知道的中共环县县委及军政力量等秘密情况。王锡存始终只说自己没有枪支弹药，也不知道什么秘密（在被捕前，他已把随身携带的手枪、子弹、手榴弹藏在了隐蔽处，敌人没搜到）。土匪头子冷笑着说：“听说你给红军县委书记当过警卫员，又当过营长，没有枪弹谁信啊！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就拿你是一个红军营长，我非枪毙你不可。”就这样，被敌人严刑拷打了一夜，王锡存没有低头屈服，敌人没有办法，就让告密者高四带路来到王锡存家里拷问他的妻子邓郁兰，邓郁兰告诉土匪，县委叫他（王锡存）学习去，他是准备去学习的人了，枪弹全部上缴了，根本没有什么枪弹。气得土匪头子暴跳如雷，指着王锡存两个月大的儿子说：“老红军就是狡猾，不低头，不缴枪，先杀了这个‘屁红子’，再杀你两口子，看你说不说。”说罢就要开枪，被高台子西洼里的乡绅王汉得拦住：“老总大人请息怒，千万别开枪，这事须得从长计议，王锡存一家都在咱们手上，还怕他不说，您要是把他一家杀了，就什么也得不到了。”

由于王汉得和当地土匪头子是拜把子兄弟，私交很深，张庭杰也赶紧在一旁帮腔：“他俩不低头，就把他们一家带走先看管起来，咱们再慢慢想办法让他开口。”

在王汉得的再三劝说下，土匪头子没有开枪，命令手下用绳子把王锡存绑在他的马尾上，押上邓郁兰和孩子一直来到杨掌。敌人在杨掌住下，晚上又把王锡存吊在一个大房子的浮梁上继续拷打，一次次打得昏死过去，又一次次用凉水浇活，王锡存宁死不屈，没有向敌人吐露半个字。

王汉得为人正直，倾向革命，为了救王锡存，他和土匪头子通了个气，让王锡存的妻子邓郁兰拿出50块大洋和150万票元交给土匪头子，由于土匪头子收了钱，再加之王汉得的关系，趁敌人熟睡时，放出重伤在身的王锡存和邓郁兰。

在王汉得的帮助下，王锡存一家连夜跑到了东洼，由于王锡存的身体受到敌人的严重摧残，加之他们的逃出已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无法再回到环县去，王锡存和妻子商量暂回老户养伤，等伤好了以后再想办法和组织取得联系。他们一家回到了现在的彭阳县白阳镇陡坡村定居养病，回来后一直到1949年10月全国解放了，他的病还是不见好，一天天加重，1950年3月，在中共固原县委工作和他一起在环县并肩战斗过的战友常学治得知他的消息，亲自找到他们夫妻俩，准备给他们安排工作，可是王锡存当时已重病在身，不能工作，在常学治的安排下，固原县补助了150元医疗费，经多方医治无效，于当年7月去世，年仅31岁。

（据固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陕甘宁边区的儿童节

毛泽东为儿童节题词。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尽管环境非常艰苦，但是每到儿童节，都举行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围绕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在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抗日根据地，我党十分重视儿童工作，从团中央到地方各级团组织，都设立儿童局，领导儿童团工作。毛泽东非常关心边区儿童的培养和教育。在延安时期，他多次为儿童工作题词。1938年6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创办了一份石印的4开小报《边区儿童》，目的是教育引导孩子们在战争环境中茁壮成长。毛泽东得知后，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和关注，亲笔为这份儿童小报的创刊题词：“儿童们起来，学习做一个自由解放的中国国民，学习从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争取自由解放的方法，把自己变成新时代的主人翁。”1938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柳林村建立了“陕甘宁边区儿童保育院”，即延安保育院，目的是保障抗日根据地的孩子们健康成长。毛泽东专门题词：“好好的保育儿童”；“为教育后代而努力”。毛泽东的这些题词，既体现了他对儿童工作的重视，又体现了对儿童工作者的严格要求。

民国时期的儿童节是4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曾连续三年为儿童节题词。1940年4月4日，毛泽东专为儿童节题词：“天天向上”。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于4月12日以醒目大字发表了这个题词。1941年4月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第十届儿童节庆祝活动，毛泽东题词：“好生保育儿童”，并发表在4月13日的《新中华报》上。1942年4月，延安纪念儿童节时，毛泽东特地为《解放日报》题词：“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这三次题词，体现了毛泽东对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殷切期望。

“抗日儿童团，爱国好少年，努力学习为抗战！机动灵活撒传单，快速行动把情报传，救护伤员勇敢上前线。抗日儿童团，为打日寇做贡献，抗战胜利把国建、把国建！”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流传在边区的儿童团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边区政府，每到“四四”儿童节，孩子们唱着这样的歌曲，举行各种活动，展示自己的力量。每年的儿童节，儿童团都要举行大检阅，检阅学习成绩、野外演习和游戏等，生动有趣，又富有教育意义。

1940年4月2日至6日，陕甘宁边区举行隆重而又丰富多彩的儿童节纪念活动，既有集中的大会，又有分组活动。来自延安保育院小学部和安塞、延川、延长、固林、安定、延安等县市的600多名儿童参加了纪念活动。在大会上，成立了儿童营，组建了总指挥部，15岁的刘德才被选为总指挥，600个孩子编为六个大队，过着有组织、有严格纪律的军营生活；孩子们在窑洞里举行政治测验，他们将平日里的学习和思考，几分钟内写在一张纸上，并评选出成绩优秀者；他们还召开座谈会，交流各根据地和边区儿童工作情况，讲述儿童团杀敌人、捉汉奸的感人事迹，提出问题互相讨论；儿童团员们举行健身操、棍棒操和队形转换、刺枪、劈刀、投手榴弹、拳术等军事项目表演；举行儿童文艺晚会、游艺运动会，放映电影，向毛主席献画像《毛泽东同志与儿童》和从家乡带来的大红枣、花生等土特产；大会还评选奖励了模范儿童和劳动小英雄等。

当时在延安等抗日根据地还流传着一首《抗日儿童团歌》：“月儿弯弯，星光闪闪，我们都是儿童团。站岗放哨，又当侦探，盘查行人捉汉奸。鬼子来了，我们就跑，跑到八路去报告。领着八路，拿着枪刀，杀退鬼子，家乡保。”陕甘宁边区的儿童全部动员起来了，积极参加抗战，查路条、送情报、演文艺节目。曾经到延安采访的华侨女记者黄薇在战地通讯中写道：“途中遇到不少站岗放哨的‘小哨兵’，他们有的站在道路的岔口，有的站在不令人注意的地方……看见远处来了生疏的人，他们便停止游戏，注意来人的一举一动。”

新中国成立后，将每年6月1日定为儿童节。此后，每到“六一”，全国各地都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孩子们在阳光雨露下快乐健康地茁壮成长。

（据民主协商新闻网）

红军援西军到固原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率领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约21800人西渡黄河，以在河西建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向河西进军。11月8日，红军西进部队改称西路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总政委。西路军在环境恶劣、无后方依托、粮食弹药十分匮乏的条件下，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马步芳、马步青等10多万敌军展开了长达5个多月的艰苦战斗，毙伤马家军25000余人，遭受重大伤亡而惨败。剩余不足4000人的部队，遭受马步青骑兵部队轮番攻击，被迫撤进祁连山，处境十分危急。1937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正式组建援西军，“增援军以四军、三十一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其骑一团组成。前方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委，左权为参谋长，刘晓为政治部主任”。即日开赴镇原、固原待命。3月上旬，得知西路军已在河西战败，红军援西军驰援已失去良机。9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援西军现停止于白杨城青石嘴之间待命”。红二十八军856人，驻防王洼、草庙、城阳、红河川一带。三十二军约3000人，驻防新集、石家沟口一带。

1937年3月下旬，党中央利用国共和谈的时机，致电西路军余部要保存力量，设法进入新疆，通过共产国际与国民党新疆地方当局沟通，帮助中共代表陈云、滕代远到甘（肃）新（疆）边界接应流落红军。5月上旬周恩来获悉部分西路军被俘人员已在送往西安途中，致电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和政委任弼时，速派部队沿西兰公路接应。党中央立即下令红军援西军开展工作，组织动员群众，迎接救助被俘、失散的西路军人员。其间，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参谋长李聚奎从河西走廊经打拉池、周原北，在彭阳王洼找到红十八军团部，被送到红二十八军军部所在地白杨城，后随政治部主任宋任穷前往镇原援西军司令部。援西军政治部按照中央指示，对归队的西路军官兵进行审查甄别，作出正确结论，尽快恢复组织生活，编入援西军或到陕甘宁根据地重新分配工作，继续为党的事业奋斗。

援西红军第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在固原东部深入宣传动员，调动广大群众参与抗日募捐的热情。由于群众害怕红军离开后遭地方民团清乡报复，群众有的藏匿深山，不敢露面，不法财主和乡保人员与红军情绪对立。援西军工作人员登门拜访乡间贤达，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听取他们对抗日支前的意见建议。农忙时，驻地红军主动帮助群众干农活，打扫卫生，刷写抗日标语等，主动和群众拉家常，做群众工作。红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在彭阳石家沟口的逢集日，主持召开群众大会，向群众宣传形势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群众为支援抗日和救援西路军积极筹借军粮。

红三十二军在茜店镇峁家堡（今属彭阳县新集乡）街道设立军粮站，有粮大户自愿为红军捐借粮食。东区城阳乡徐塬（今属红河镇）小学教师徐满库带头捐献谷子2000千克，王石沟农民徐效衍捐粮15000千克、猪羊10多头（只），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与固原东区联保抗日救国委员会向徐效衍赠送“抗日先锋”红色软匾。蒿店卧牛坪李世昌、新集魏家河魏连川等一批开明人士纷纷慷慨解囊，带头向红三十二军捐借粮食，红三十二军一一赠送“支援前线光荣”软匾。城阳乡抗日救国委员会主任余如珂接到援西红三十二军罗炳辉军长协助筹粮的信件，召集有粮户开会，筹齐粮食送给红军。

1937年3月，红二十八军干部周学琳介绍石家沟口（今属新集乡）农民马义仁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红二十八军后勤干部何仲发在石家沟口发展农民姬满祥、马义兴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中共石家沟口党支部成立，姬满祥任党支部书记。1937年3月6日，红二十八军在城阳平安寨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固原东区联保抗日救国委员会，并赠送“团结御侮”软匾。援西军协助中共固北县委在彭阳境内建立崖堡子、堡子岘、三个窑、米家、虎家岘、何家岘、赵沟、李渠、孙湾、王洼10个乡级抗日救国委员会；协助中共固原工委在麻子沟圈、红河、海巴、石家沟口、峁堡、上王、任湾、城子杨家、黄沟、韩家崖窑、韩寨建立11个乡级抗日救国委员会。1940年5月，彭阳境内抗敌后援会全部撤销，职能转入新组建的各战区动员委员会。

援西红军重视开展对国民党政权组织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统战工作，共同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国共两党地方政权组织、驻军互派信使，友好合作。红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亲自接见红河徐塬小学教师徐满库，称赞他深明大义，带头捐粮。红三十二军邀请驻地乡保人员，共商抗战支前大计。

援西红军在白杨城和刘家沟驻地开展绿化工作，每名战士栽下一棵“红军树”。红二十八军在堡子崾岘阳洼开垦荒地种植秋杂粮100多亩，红军撤离时，把即将成熟待收的粮食分给贫苦群众。红三十二军在石家沟口街道办起商店，向群众每户赠送12.5千克黑豆。红军在驻地工匠协助下，用手工摇钻制作“折腰枪”补充红军和地方武装。

援西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对西路军失败、兄弟姐妹惨遭不幸痛心疾首，群情激愤。因此，在援西军中揭露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肃清其分裂造成的影响，帮助广大官兵与其错误路线划清界限，成为整军的一项重要内容。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作出后，援西红军及时召开第一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迅速开展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进行各项整军学习活动。4月下旬，任弼时主持召开援西红军第二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传达中央政治局决定。刘伯承等军政首长要求，要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与张国焘及其错误严格区别开来，坚持正面教育，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坚持和风细雨的工作方法，对一时转不过弯的官兵耐心说服引导，杜绝开批判会，更不允许处分任何人。在学习活动中，采取大会作报告与分组讨论、个别谈心相结合的方法，经过干部特别小组会议、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支部大会和支部小组会集中学习讨论，联系实际作检查，开展反对单纯军事观点、本位主义等错误思想和行为的斗争，普遍进行党性原则和理论教育，整顿加强军纪。

1937年5月，红三十二军离开彭阳，移驻陕西省富平县。7月中旬，红二十八军离开彭阳，奉中革军委命令开赴陕西三原，改编为八路军，投入伟大的抗日战争。**（据《固原通史》）**

贺龙抓后勤

1947年7月，中共中央小河会议决定，贺龙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身份，统一领导陕甘宁、晋绥两个边区部队及后方工作，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西北解放战争。

贺龙首先同习仲勋、林伯渠、王维舟、贾拓夫等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人一起，迅速实现了两区财政经济的统一。贺龙兼任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并将两区的银行、贸易公司合并，成立了统一的西北农民银行和西北贸易公司。他又主持了联防军后勤工作会议，在军队供给上实行统筹统支，将财务部门和供给部门合并，做到财供统一。他还指示陕甘宁各地成立兵站，由地区专员和县长兼任站长，负责筹粮、筹款、运输、供应，使野战军走到哪里，便可以在哪里得到供应。

粮食成为“西野”必须首要解决的问题。为保障指战员的粮食供给，贺龙四处筹措，通过周恩来向晋冀鲁豫解放区急调10万石粮食，并领导各级人民政府动员和组织了庞大的支前队伍，把粮食运往陕北战场，保障了解放军部队的日常需求。

西北战场打的是大仗，部队对武器弹药的需求量相当大，炮弹尤其缺乏，彭德怀、习仲勋经常致电贺龙请求支援。为扩大军工生产，贺龙把陕甘宁、晋绥两个地区的军工企业整合起来，到1948年，共建设14座军工企业，生产了大量山炮弹、迫击炮弹、手榴弹、炸药、子弹，有力地支援了西北解放战争。

1947年冬季来临，为给前方将士们筹备急需的越冬被服和经费，贺龙决定将陕甘宁、晋绥的土特产运到边界地区，再让商人们转运到国统区出售。他调派绥蒙军区副政委张达志带两个骑兵团去执行这一特殊任务。他对张达志说：“你现在的头衔是陕甘宁晋绥游击司令，但你这个司令主要任务是做买卖，把土特产卖掉，换成前线急需的金子、银圆以及棉花、布匹等物资。”张达志做了3个月的买卖，换回了大量现金和物资，有力地支援了部队。

在兵源补充问题上，贺龙的办法是加强联防军区地方兵团建设：在部队压缩机关、充实连队；在老区动员失散兵员归队；在新区动员群众参军、组织游击队、扩大地方兵团。这样做一方面可作野战军的补充兵团；另一方面也可以升级为野战兵团。毛泽东称这一办法很有战略眼光。

1947年9月20日，经请示中共中央军委，贺龙以警一旅、警三旅和骑兵第六师合编为第四纵队。不久，第四纵队拨归西北野战军建制，充实了西北野战军的力量。在贺龙的领导下，仅1947年在陕甘宁和晋西北等解放区就动员了3万人参加野战军，5万人参加地方兵团。到1949年6月，西北野战军已从小河会议时的3个纵队，发展成按三三制编制的两个兵团、6个军、18个师22万人的大军，为西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据《人民政协报》）